

近代汉语语法史

蒋绍愚 曹广顺 主编

研究综述



商務印書館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资助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

蒋绍愚 曹广顺 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蒋绍愚,曹广顺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ISBN 7-100-04679-3

I. 近… II. ①蒋…②曹… III. 汉语—语法—语言学史—研究—近代 IV. H1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456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JÌNDÀI HÀNYǔ YǔFǎSHǐ YANJIŪ ZŌNGSHÙ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

蒋绍愚 曹广顺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679-3/H·1162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2 1/2

印数 4 000 册

定价: 4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代词·····	31
第三章 词缀·····	66
第四章 副词·····	114
第五章 介词(附连词)·····	150
第六章 动态助词·····	198
第七章 事态助词·····	226
第八章 结构助词·····	253
第九章 语气词·····	274
第十章 述补结构·····	305
第十一章 处置式·····	352
第十二章 被动句·····	379
第十三章 比较句·····	417
第十四章 选择问句·····	447
第十五章 余论:从一般历史句法学看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现状···	482
后记·····	516

第一章 绪论

汉语语法的系统研究是从《马氏文通》开始的,至今约一百年。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开始得更晚,在 20 世纪的 20 年代,黎锦熙提出了“近代语研究”的问题,但偏重于词汇。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吕叔湘写了几篇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论文,被称为“近代汉语研究的黎明”。经过半个世纪几代学者的努力,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从无到有,从草创到逐步深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书打算把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作一个比较系统的总结。

一、“近代汉语”的界定和本书的范围

首先要说一说什么是近代汉语。

吕叔湘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说:

“什么是近代汉语?这涉及汉语史的分期问题。一种语言在某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就可以把这以前和以后分为两个时期。可是语言的演变只有通过书面记录才得以观察,而这又必然要受到用以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影响。汉语是用汉字记录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难于如实地反映口语。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根据这个情况,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

2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

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

他在为刘坚《近代汉语读本》所作的序中又说:

“我们的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

吕叔湘的这两段话非常重要。第一,他强调了近代汉语在整个汉语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根据他的意见,“近代汉语”不是漫长的汉语发展史的若干个历史时期之中的一个,而是整个汉语史上两个大阶段之一。第二,他指出了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密切联系。且不说要不要把现代汉语包括在近代汉语之中,他所指出的“现代汉语……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是完全符合汉语的实际的。

吕叔湘的论述对语言学界有很大影响,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对于他提出的“二分法”和近代汉语的上下限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研究工作的实际状况出发,现在学术界一般还倾向于三分,近代汉语的上限大致定在晚唐五代,下限大致定在清代中期;近年来,还把古代汉语分为“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个阶段。但对近代汉语研究的范围并不以晚唐五代到清代中期为限,早于和晚于此时期的语言资料和语言现象,只要和近代汉语时期的语言有关,也都在近代汉语研究的范围之内。

简单地说,近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前身。从语法方面看,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主要指上古汉语)相比,有若干重大的特征性的区别,而这有特征性的语法形式,大体上是在中古汉语时期萌芽,在近代汉语时期形成或发展成熟的。下面择要加以说明:

1. 动词词组

古代汉语只有“V+O”或“V+V+O”。从南北朝开始,V和O之间逐渐出现了一些表态貌或表能性的语法成分,如各种补语、用在述补结构中

的结构助词以及动态助词。

2. 名词词组

古代汉语用“所”和“者”把动词或动词词组变为名词词组,用“之”来连接名词词组的定语和中心语。从唐代开始,用“底”来表示这些语法功用,后来又代之以“的”。

3. 指代词

唐五代产生了近代汉语具有特征性的代词系统,除了“我”从古代沿续下来以外,“你”“他”和复数词尾“们”以及“这”“那”“什么”“怎么”都是新产生的。从现代汉语方言的情况来看,凡是第三人称代词用“他”的,一定是官话系统,而非官话系统的方言或是用“伊”(闽语),或是用“渠”(吴语、赣语、客语、粤语)。凡是远指代词用“那”的,一定是官话系统,而非官话系统用“许”(温州话、闽语、南昌话),用“个”(粤语、客语)。为什么官话系统的指代词和唐五代新产生的指代词一致?这是因为唐五代以来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所以这些基本的指代词都沿续不变,直到现代汉语的北方话依然如此。

4. 介词词组位置的变化

古代汉语中介词词组的位置基本上在动词之后。到近代汉语中,表处所和表工具的介词词组很多移到了动词前面。表比较的句子也是如此,古代汉语是“A于N”,近代汉语逐渐变为“比NA”,介词词组也移到动词前面。“把/将”字句和“被NV”式的被动句是新产生的,介词词组也在动词前面。(以上四点,大体上根据梅祖麟的意见加以概括。)

本书所要总结的,也就是关于这些特征性的语法形式如何产生和发展成熟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语法形式有的产生于近代汉语时期,当然属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范围;有的产生在近代汉语时期之前,但是其广泛使用是在近代汉语时期,这些也属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范围。当然,有些在近代汉语时期产生的语法形式(如“V将”的“将”),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复存在,这些语法形式也属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范围。但是,关于系词“是”的产生,我们没有把它包括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范围之内。

4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

系词“是”是现代汉语所有、先秦汉语所无的。但一则它产生得早,早在战国末期(至迟在汉初)就已产生了,二则它的发展在东汉时已经完成,它的整个发展过程都在近代汉语时期之前,所以,关于系词“是”的研究,本书没有涉及。

二、近年来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进展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将在本书后面各章中分别就各个专题加以总结。在《绪论》中,我们将从总体上对半个多世纪以来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研究的进展,作一个简要的叙述。

近年来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进展表现在:1. 研究范围的扩大。2. 研究的深入。

先说研究范围的扩大。

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讨论得比较深入的是这些问题:动态助词“了”“着”等,结构助词“底”“地”,述补结构,“把/将”字句,新兴被动句(各种形式的“被”字句、“教”字句、“吃”字句、“给”字句)。这些问题都是现代汉语区别于古代汉语的重要语法问题,也是关系到近代汉语整个语法体系的重大问题。研究者首先把目光集中在这些问题上,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近年来,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除了上述热门话题继续研究外,一些过去研究得比较少的问题开始有人研究。如副词、介词、选择问句的历史发展、词序的历史演变等,都研究得比较深入。这些在后面有专章讨论,此处从略。除此以外,量词的研究有王绍新的《唐代诗文小说中名量词的运用》、《量词“个”在唐代前后的发展》、《从唐诗中的场、遭、觉、回、度看唐代量词的发展》、《祖堂集中的动量词》、《隋唐五代的动量词》(均收于《课余丛稿》,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洪艺芳《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之量词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等,语气词的研究有孙锡信的《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1999),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

研究成果。

从时代看,以往对近代汉语的前期(唐宋时期)研究得比较多,而对近代汉语的后期(元明清时期)研究得比较少。尤其是元代,很少涉及。元代的汉语,受蒙语的影响较大,如果不懂蒙语,研究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也许这是对元代汉语研究得比较少的一个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元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方面的研究应该加强。近来,已经有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如祖生利的博士论文《元代白话碑文研究》对元代白话碑作了进一步的收集和整理,对有的碑文作了蒙汉对照,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研究。近来在韩国发现了比《老乞大谚解》更早的《老乞大》版本(韩国的学者定名为《原本老乞大》),经研究,可以确定是元代的作品。日本的学者金文京、玄幸子、佐藤晴彦和韩国的学者郑光很快地用日文作了译注和解说。一些学者对此作了研究,如李泰洙《〈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所以,近来对元代的汉语的研究有了加强。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更重要的进展是研究的不断深入。

推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深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人们普遍认识到了近代汉语是汉语史上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有一批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其次,20世纪以来,新发现了一些近代汉语研究资料,如《祖堂集》、《原本老乞大》、《训世评话》、《型世言》、《燕京妇语》等。近年来计算机在语言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近代汉语语料库陆续建立,这些都推动了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但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的更新。这是我们在《绪论》中要着重加以讨论的。

研究方法的更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材料的运用更加扎实,对材料的分析更加细致,对材料的发掘更加深入。

语言史的研究,材料是基础,基础打得不牢,研究得出的结论就不会可靠。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也不例外。一些优秀的研究著作都是以扎实

6 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

的材料为基础的。近年来,近代汉语语料库逐步建立,一些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的语料一般研究者都能得到,计算机的普遍运用,使人们有可能对某一部作品或某一时期的作品进行穷尽性的研究,这些都为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与此同时,数量统计也成了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一般会比较全面、可靠。

但计算机毕竟只是一种辅助工具,电脑不能代替人脑。有了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语料,还需要对语料的性质作鉴别和分析。近代汉语的语料相当复杂,有一些作品的真伪和时代需要鉴别。太田辰夫在《中国语历史文法·跋》中提出了“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的问题,指出同时资料比较可信,后时资料难免有后人的改动,所以在使用时必须慎重。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普遍的注意,研究者对语料的选择和使用都比较慎重。如臧晋叔《元曲选》一般不作为元代的语言材料,《京本通俗小说》更不作为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资料,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引起进一步的注意。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在《红楼梦》前已用语气词“吗”字,其实,他所依据的版本均为近年新版的明清戏曲小说选本,所以结论并不可靠。(参见王魁伟 2000)就是一些时代大致确定,真伪大致无疑的作品,其语料也还有一个分析的问题,这一点似乎还注意得不够。其实这里问题也相当复杂,牵涉到语言的时代问题、方言问题、文白问题。如:《晋书》、《南史》等是唐代人编纂的前代史书,其中的语言究竟是反映魏晋南北朝的语言还是唐代的语言?以往研究者大体认为其中的对话部分可能比较接近前代的实际语言,但柳士镇(1988)指出,这也不尽然,对话部分也可能经过修史者改动。又如《祖堂集》,有些研究者认为其中有闽方言成分,如刘勋宁(1998)说:《祖堂集》中的“V 也无”句型和福建、江西的方言有关,而“V 不”则是北方的句型;但也有研究者认为,《祖堂集》中有闽语的成分是肯定的,不过究竟哪些是闽方言,哪些是通语,还需要讨论。如汾山和尚(福建人,长期在湖南传教)与仰山和尚(广东人,长期在闽赣传教)对话,用 18 例“VP 不”,只有 1 例“VP 也无”,1 例“VP 也未”,而南泉和尚(河南人,在安徽传教)说话有 3 例“VP 也无”,赵州和尚(山东

人,在安徽传教)说话有3例“VP也无”。应该说“VP不”是当时通语的句型,而“VP也无”当时不限于福建。(见张美兰 2003)再如《朱子语类》中,有的是朱熹讲的同一段话,由两个学生记录下来,一个学生的记录比较口语化,另一个学生的记录却文言成分很多;可见,把《朱子语类》的语言全部当作反映当时口语的材料来使用也是不行的。上述研究表明近来人们开始注意了对语言材料的分析,这是研究的一种进展。

在详尽占有资料 and 进行精确统计的基础上,还需要研究者进行分析和归纳。一些成功的研究,都是这样进行的。比如,唐钰明(1987、1988)对被动句的历史发展作了详尽的描写和统计,理清了被动句发展演变的脉络。袁宾(2000)统计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带宾语的被动句在全部被动句中的比例,又统计了各个时期带宾语的被动句在全部被动句中的比例,然后把两者加以比较,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被动句的时代提出质疑。这都是成功地运用材料和统计进行研究的例子。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还有赖于材料的发掘。所谓材料的发掘,不仅仅是指发现新的语料和新的版本,也指在原来大家都已知道的语料中发掘出对语法研究有重要意义的材料。近年来,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者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语料,有些对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能起十分关键的作用,如发现《三国志》和《佛本行集经》中的“将”字句,可以把“将”字句产生的时代提前。发现北宋毛滂词“放下了日多萦系”这一例,就无可辩驳地证明至少在那时“了”已经不是补语,而是动态助词。有些语料的发现,能启发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如在《元典章·刑部》中发现“V 讠 O”的例子,会使我们对动态助词的发展过程以及方言和通语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思考。发现南北朝时期“已”放在瞬间动词后面的用法只在一些汉译佛典中有,而在同时期的一些中土文献中没有,会使我们考虑这种现象与梵文的影响有没有关系。

(二)对语法演变作历史的、动态的研究。

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很多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论文都是把某一部书或某一时代的某种语法现象加以罗列、分类和统

计,也就是说,是作平面的静态描写。作为基础工作,这种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整个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这一步,那我们的研究就谈不上深入。只有历史的、动态的研究才能把语法演变的研究引向深入。

对述补结构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有的论文认为,述补结构在《尚书》中就有。这是简单地在古代典籍中找出类似于现代汉语中述补结构的例子,而没有深入研究述补结构的历史演变。在语法史研究的初始阶段,出现这样简单化的结论并不值得责怪。后来,我们就看到,对述补结构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了。研究者注意到,述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说得清楚的。1. 述补结构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如:述补结构有不带“得”的和带“得”的,有连用式和隔开式,补语有表趋向的、表结果的、表动态的、表能性的等等,产生的时代各不相同,来源也不一样。这些不同类型的述补结构究竟什么时候产生,怎样产生,怎样发展,彼此之间怎样相互影响,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2. 就其中的述结式来说,也有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述结式是由连动式演变而来的,其演变过程究竟如何? 述结式有(Vt + Vi)和(Vi + Vi)两类,这两者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的? 述结式的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有各种区别,它们有什么不同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结果补语和动态补语如何区分? 3. 述补结构有带宾语和不带宾语的区别,宾语位置也有所不同,这和述补结构的发展有什么关系? 各类述补结构中,述语和补语通常由哪些动词(或形容词)充当? 这和这些动词(形容词)的语义特征有什么关系? 各个述补短语的使用频率有所不同,这和述补结构的发展和述补短语的词化有什么关系? 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历史的、动态的研究加以解决。现在,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但是,都已经在研究中涉及了,有些已经研究得比较深入。所以,对述补结构的历史的、动态的研究,把这个问题引向深入。

对“把/将”字句的研究也是如此。20 世纪 50 年代初,王力(1958)、祝敏彻(1957)指出,“把/将”字句是由“把/将 + O₁ + V + O₂”的格式演变而来

的。到 80 年代, Bennett(1981)、陈初生(1983)认为,“把/将”字句是由古代的“以”字句发展来的。这两种意见哪一种对? 其实,“把/将”字句是一种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复杂的多元性的语法结构,它的来源不止一个。由古代的“以”字句演变来的是“把/将”字句中的一种,它是早期的“把/将”字句,这种“把/将”字句的特点是句中除了“把/将”字句的宾语外,谓语动词后面还有一个宾语。由“把/将 + O_1 + V + O_2 ”的格式演变而来的是“把/将”字句中的另一种,这种“把/将”字句中谓语动词后面的宾语一般都已消失,到述补结构发展起来以后,谓语往往用述补结构充当。在以后的发展中,“把/将”字句的形式和功能都有相当大的变化。正因为“把/将”字句是一种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复杂的多元性的语法结构,所以,很难找出适合于从古到今各种“把/将”字句的结构特点和功能特点。就是现代汉语中的“把”字句,也是“把/将”字句历史发展的积淀,也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平面的、单一的结构来看待。也就是说,对“把/将”字句的研究,不能用平面的、静态的眼光,而要用历史的、动态的观点,这将是今后“把/将”字句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三)注意相关语法形式的演变之间的联系和影响。

语法是一个系统,各种语法形式之间会有相互影响。有些问题应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才能研究得比较深入。

比如,对虚词的研究在古代就比较重视,但往往只是就单个的虚词作训诂式的解释。20 世纪 50 年代,注意到一些虚词的历史演变,如疑问语气词“吗”是由动词“无”演变来的,动词词缀“了”是由“完结”义的动词“了”演变来的,但没有把它们和句式联系起来。实际上,有些虚词和句法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表完成貌的动态助词“了”的产生,就和表完成的句式的发展密切相关,在“V + O + 了”出现之前,就已经有“V + O”之后加完成动词“毕”“竟”“已”“讫”的句式。而这些句式,在先秦就能看到,到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有较大的发展。梅祖麟(1981、1999)把这些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表完成貌的动态助词“了”的历史发展。疑问语气词的研究也是如此。众所周知,疑问语气词“吗”是由“无”——“摩”——“麽”发

展来的,而“无”本来是一个动词,当“无”处于句尾时,究竟是动词还是疑问语气词?伍华(1987)和吴福祥(1997)都把疑问语气词的发展和疑问句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吴福祥认为,VP - neg 反复问句从后汉开始就分化为两类:反复问句和非反复问句,处于这两类疑问句句尾的“不”“否”“无”也相应地分化为两类:否定词和语气词。而“摩/麼”由语气词“无”演变而来。伍华的结论和吴福祥不尽相同,但在把疑问语气词的发展和疑问句的发展联系起来研究这一点上,两篇文章是一致的。这种方法值得提倡。

又如述补结构兴起以后,特别是“V + O + C”变为“V + C + O”之后,动词和宾语之间被补语隔开,但“宾语有以‘把’字提前之式,此即另辟蹊径以接近动词”,这一点吕叔湘(1944)就已经指出。Chu(1987)也说:“既然自唐朝至今,结果补语一直与‘把’相互依存,两者之间很可能有某种联系。我们的解释是:动词后结果补语的兴起,促进了宾语左移至动词前的位置。”虽然他们没有详细的论证,但述补结构的发展对“把”字句的发展显然是有促进作用的。不过,有人把述补结构的产生说成是处置式产生的动因,这又违反了汉语史的事实。还是吕叔湘(1948)说得好:“把字句式初起的时候也许是没有特殊用途的一种句法,但是它在近代汉语里应用的如此之广,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情况需要把宾语挪到动词之前去。”总之,我们应当重视相关语法形式演变之间的联系,但在分析这种联系时要实事求是,既不能夸大,更不能臆断。述补结构的发展究竟对“把/将”字句有什么影响,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还有,受事主语句的发展,对被动句的发展也会有影响。原来表使役的“教/给”字句发展为被动句,其条件是受事出现在“教/给”字句的句首,而这一条件大约是在唐代才具备的,因为汉语的受事主语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见蒋绍愚 2004)受事主语句是一种“有标记”的语序,从跨语言的研究来看,各种语言的受事主语句有一些共同的语义、语用特点,但是汉语受事主语句的发展又有自己的历史进程。汉语的受事主语句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发展的?是什么因素影响它的发

展?它的发展又对汉语语法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我们应当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各种语法形式之间的影响问题,在汉语语法发展史上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候,这种影响是以一环套一环的方式起作用。如:在先秦时,表处所的介词词组绝大多数放在动词之后,采取“V+于+L”的形式。后来方位名词的发展,使得“V+于+L”中的“于”可以省去;而这种“于”的动摇以至于消失,又使得先秦时组成这种词序的“抽象原则”逐渐消失,于是,新的词序排列的原则“时间顺序原则”代之而起,处所词按照时间顺序或者放在动词之前,或者放在动词之后,于是,汉语表处所的介词词组在句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见李崇兴 1992,蒋绍愚 1999,张赅 2002)

(四)注意把语义分析和语法研究结合起来。

把语义分析引入语法研究之中,是近年来语法研究的一个总趋势,这对语法研究的深入是大有好处的。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趋势。

最明显的是对于述补结构的研究,最初只是把述补结构分为趋向补语、结果补语、程度补语和可能补语等几大类,这主要是从形式上区分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又发现,同属于原来所说的“动词+结果补语”的这种形式,其补语的语义指向(即补语跟施事、受事以及动词本身之间的语义关系)是不一样的,因此可以再分为几小类,而这些不同小类的述补结构产生的时代和产生的途径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就使得述补结构的研究深入了一步。

又如,在动态助词的研究中,研究者认识到,在“补语→动态助词”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一个语法成分的虚化程度往往和这个成分之前的动词的语义类别有关。如“却”最初只跟在有“去除”“消失”义的动词之后,后来“却”前面的动词范围扩大,不限于“去除”“消失”义,“却”也就进一步虚化。(见刘坚等 1992)“了”也是这样,出现在持续动词后面,往往表示这个动作过程的结束,这时“了”还比较多地保留完成动词的原意;如果出现在瞬间动词的后面,“了”就进一步虚化。(见吴福祥 1996)有时一个语

法成分的虚化也和后面的宾语的语义类别有关。如“V 着”,早期后面的宾语都是处所名词(少数是时间名词),这时的“着”是介词或补语。后来“V 着”后面出现了指人或指物的宾语,这时“着”就发展为动态助词。同时,在“着”语法化的过程中,“着”前面动词的类别也扩大了。(见刘坚等1992)这都是注意到语义和语法演变的相互影响。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深入一步:在一个语法成分的语法化过程中,和它搭配的其他语法成分语义类别的变化,究竟是语法化的动因,还是语法化的结果,还是两者有交互的影响?这是可以继续讨论的。

再如关于“把/将”字句,究竟哪些语义类别的名词可以作“把/将”的宾语,哪些语义类别的动词可以作“把/将”字句的谓语,“把/将”字句有什么语义、语用特点,这些问题都和“把/将”字句的产生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研究者从现代汉语的角度讨论得比较多。但近代汉语时期“把/将”字句的情况比现代汉语复杂得多,从现代汉语平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有一些未必能适用于历史上的“把/将”字句。近代汉语语法研究应当从近代汉语丰富的语料出发,分别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把/将”字句中的语义关系作深入的考察,这样,一方面有助于弄清楚“把/将”字句历史发展的面貌,另一方面有助于更深入、更全面地把握“把/将”字句的语义、语用特点。

当然,语义的分析应当和语法形式的分析结合起来。仅仅根据语义来研究语法是不行的。比如,在研究述补结构的时候,如果仅仅根据“V + V”格式中前后两个动词有动作和结果的关系就确定其为述补结构,那就会把述补结构的范围不适当地扩大,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尚书》中的“扑灭”不是述补结构,而现代汉语中的“扑灭”无疑是述补结构。在研究述补结构的时候,究竟怎样把语义分析和语法形式的分析结合起来,这正是许多研究者深入探究的问题。又如,说瞬间动词后面的“了”比持续动词后面的“了”虚化程度高,也不能仅仅凭语感,而要有语法形式、语义标记的支持。如果我们找到了两种“了”在语法形式上的区别,比如说,“持续动词 + 了”中间可以插进“已”“未”等副词,而“瞬间动词 + 了”中间不能插进

“已”“未”等副词,这样才能使语义分析的结果为语法形式的分析证实。

总之,我们追求的是两者的结合:或者是从语义入手,寻找不同语义的语法表现;或者从语法形式入手,寻找不同语法形式的语义根据。这样才能把语法研究推向深入。

(五)把语法演变放到比较广阔的背景上来考察。

语法演变不是孤立的,有些问题要放到比较广阔的背景上加以考察,才能看得更清楚。

首先,是把某种语法演变放到同类语法演变的背景上来考察。比如,在近代汉语时期,表完成貌的动态助词不止一个,除了“了”以外,还有“却”“取”“得”“将”“着”等,它们各有自己的语法化的途径以及发展或消亡的过程,但它们既然有相同的语法功能,而又在一个历史时期中共存,彼此之间就会有一定的差别,也会有相互的影响。所以,把它们放到一起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刘坚等(1992)、曹广顺(1995)正是这样做的,从而提出了“了”由宾语后移到动词前是否受“却”的影响的问题,也由此而探讨了汉语动态助词语法化的规律。

其次,是把某种语法演变放到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类似的语法演变的背景上来考察。比如,近代汉语中用于选择问句的“还”和“还是”是怎么来的?有学者认为“还”是对中古时期选择问的记号“为”的取代。李崇兴(1990)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表选择问的“还”是从“还”的表转折的用法演变来的,他举出“可”和“却”作为旁证:“可”和“却”在近代汉语中都可以联系选择问,它们的来源都是表转折的副词,由此而发展为选择问记号的过程也和“还”相同。由于有这一旁证,他的结论就比较可信。又如,结构助词“底”的来源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有的认为来源于“之”,有的认为来源于“者”,两种说法都有难以解释的问题。那么是否可以不局限于这一争论,把眼光放宽一点来看一看呢?冯春田(1991)、石毓智、李讷(1998)、江蓝生(1999)都另辟蹊径,提出了新的看法。尤其是江蓝生(1999),认为结构助词“底”的来源是方位词“底”,并指出在唐代之前和唐代之后,都有方位词演变为结构助词的,在六朝时有“所”和“许”从处所词